

## 陈云与新中国 50—70 年代的对外贸易

叶明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外贸易也在艰难的环境中展开。陈云本着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领导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最终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不但使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也为随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关键词:**陈云;对外贸易;50—70年代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2-0045-06

在全球化浪潮中,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愈益密切,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都对本国或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考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贸易,可以给它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参照物。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今天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指标。作为新中国两代国家领导人的陈云,一直参与和领导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研究他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和贡献,相信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富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打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为新中国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开端

在旧中国,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受制于帝国主义列强国家的控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关税主权及海关管理权。因此,中国的金融、航运、保险、公证仲裁等多方面的权利,尽皆落入帝国主义国家的掌控之中,他们以廉价的工业制造品交换中国重要的农、矿原材料和手工业品,使得中国的对外贸易成为它们控制、掠夺中国的重要手段。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欺凌,促使中国人渴望建立自己独立自主的崭新国家。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革命中取得胜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原因。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目标全面反映了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压迫和剥削的意愿。具体到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他们希望本着平等往来、互惠互

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原则,建立一种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在这种秩序里,所有国家都应该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对方的主权和各自愿望。两国之间相互的贸易发展,要符合双方彼此的需要,进行等价交换,促进相互之间的经济发展。早在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提问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原则。毛泽东说:“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sup>[1]</sup>同样的思想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也有明确表达。周恩来在1949年12月下旬(22、23日)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发表题为《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的讲话,其中,在内外关系中一节,周恩来说:“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sup>[2]</sup>“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

收稿日期:2014-12-15

作者简介:叶明勇(1964—),男,湖北随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发展理论与社会转型研究。

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sup>[2]11</sup>

中国共产党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原则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试图把新中国的红色政权扼死在摇篮里。新中国于是将对外贸易的重心转向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及东欧国家,优先开展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关系。当时,中央任命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他根据新的外贸关系,领导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措施,冲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打开通路,加强了我国同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迅速克服了新中国伊始财经方面的严重困难。

1949年7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在对外贸易方面考虑的重要问题便是突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问题,提出了“一北一南”的方针,即向北发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向南利用港澳原有贸易通道。另外还要求积极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以外商代销规避封锁等一系列办法拓展外贸渠道<sup>[3]2</sup>。

1951年4月24日,陈云在中财委第五十四次委员会议上在谈到关于进口器材的问题时指出:最近能从英、美等西方国家进口的器材越来越少,必须转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口。考虑到它们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相关部门要早日提出订单计划<sup>[4]94</sup>。同年6月16日,陈云在接受捷克通讯社和《红色权利报》驻华特派员采访时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极为重要。这种经济合作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效地反对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sup>[4]104</sup>。在这个明确思想指导下。1949年,苏联对中国贸易额为2630万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8%,1950年上升为24190万美元,占29.8%,为1949年的9倍多。1950年中国对苏贸易额也呈增长趋势。1951年,在美国加紧“禁运”“封锁”的形势下,中国与苏联的贸易进一步发展。1951年3月14日,两国签订了《中苏铁路联运协定》,以方便货物运输。同年6月2日中财委作出决定,凡由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波兰、匈牙利、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货物,按最低税率

征税。经过双方的努力,1951年中国对苏联出口及转口总额比1950年增加121.91%,占全年出口及转口总额的42.25%。1952年的中苏贸易总额在1951年大幅度增长的基础上,比1951年又增加23.71%,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49.97%。从1951年11月起,中国派出74人的大型贸易谈判代表团赴苏参加1952年的贸易谈判。全团分综合、进口、出口、设计、新疆、旅大船渠<sup>①</sup>6组,其中进口组分成五金、机器、机床、交通电讯、化工、杂品、特殊订货等8个小组,设计组分成鞍钢、机械电工、电力矿冶、轻化纺、技术援助等6个小组。组团的规模反映了中国当时对与苏贸易的重视和莫大希望。贸易谈判是在平等互惠、友好合作、相互协商的原则下进行的,易货范围和易货数额都比以往扩大了。1952年中国对苏联贸易出口额为14.78亿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55.88%,进口额为11.79亿元,占全部进口总额的46.82%。对苏贸易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sup>[5]28-30</sup>。

要冲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仅靠对苏联东欧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还不够,陈云还想办法积极开展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地区的对外贸易。

1952年5月14日,陈云对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提出新思路,指示相关部门在这方面要做进一步努力,以图打开新的局面。他特别提到港澳和南洋地区,他说,港澳和南洋需要我国一些土特产,我国不能主动放弃与他们的贸易机会,放弃这个市场对我国不利<sup>[4]138</sup>。同年10月2日,陈云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与斯里兰卡贸易的会议。根据会议精神,会后布置外贸部以国际市场的价格向斯里兰卡售出大米,同时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5%~8%购进斯里兰卡的橡胶。这一决定在帮助斯里兰卡政府解决缺少大米困难的同时,对于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禁运起到积极作用<sup>[4]150</sup>。10月29日,陈云又致信周恩来,建议将增加出口给斯里兰卡的大米,改向印度尼西亚出口以换取橡胶<sup>[4]153</sup>。1954年中央对外贸易部召开了第一次扩大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强调要保证对港澳地区的物资供应,积极扩大对港澳的出口以及经港澳转口到东南亚的贸易通道。此后,我国内陆地区对港澳的出口贸易量逐年递增。其中,从1950年至1957年,增长了22.7%。对亚非贸易额由1950年3.6亿美元,上升到1957

①大连修船造船工厂的简称。

年 7.67 亿美元。在这个时期,中国内陆地区通过港澳市场,以多种渠道和方式,向一些对中国实行贸易限制和歧视政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转销商品,并从西方国家购进一些“禁运”物资。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中国国民经济,逐步开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sup>[6]21-22</sup>。

在陈云的指导下,外贸部门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胆开展直接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1952 年 4 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分别同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 11 个西方国家企业签订了各项贸易协议<sup>[6]22</sup>。1954 年 9 月 17 日,陈云还指示外贸部适当削减对苏联的出口,削减的部分作为储备物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藉此换回更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外汇,如果中国手中有 6 000~8 000 万美元外汇储备,可以解决很多问题<sup>[4]221</sup>。据统计,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1957 年底比 1952 年增长了 6 倍多<sup>[6]23</sup>。

在陈云领导下,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使得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一个好开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国内经济建设的不足。

二、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支持国内生产,有效补充了国民经济建设

新中国进入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都有很大变化。国际上,逐渐形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中国和苏联关系恶化,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导致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贸易也急剧下降,1965 年,中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出口占同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降至 9.9% 和 7.9%,进口比重降为 9.2% 和 6.3%<sup>[7]5</sup>。国内,由于 50 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国家整个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困难的调整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转向西欧国家,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支持国内正常的经济建设。

1960 年我国粮食产量由 1957 年的 3 900 亿斤降为 2 870 亿斤,人均产量由 603 斤降为 435 斤,农民生活困难,国家粮食库存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粮食调拨和供应都出现十分紧急的情况,有些地区粮食出现脱销现象。陈云经过三个月的考察回到北京提出的第一个应急之策是进口粮食。在当时“极左”的政治形势下,吃进口粮就等于是修正主义的表现。陈云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要承担很大的政治

风险。但一向坚持实事求是、办实事的他还是决定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陈云决定先找粮食部党组书记谈粮食进口问题。粮食部党组经过讨论后赞同陈云的意见,决定以组织名义向中央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将报告经李先念、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最后,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从 1961 年起进口粮食。1960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率先提出进口粮食意见的陈云提出表扬。从中央作出进口粮食的决策到第一船进口粮运到天津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sup>[8]22</sup>。难能可贵的是,陈云不仅提出进口粮食这一重要策略问题,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还亲自检查有关情况。第一批进口粮食到岸后,1961 年 2 月 7 日至 11 日,陈云亲自到天津新港码头考察进口粮食的卸船和装车情况<sup>[9]64</sup> 以及河北粮食安排情况。开始时粮食卸船装车有漏粮现象,陈云指示进行了改进<sup>[10]132</sup>。

在成功进口第一批粮食解决国内急需后,陈云进一步考虑如何为进口粮食赚取外汇,而要想有外汇就要有东西出口。为此,陈云亲自抓对外贸易的出口工作。陈云在阐明进口粮食的决策时就指出有些农副土特产,比如核桃、瓜子、红枣等要出口,并提出要建立出口商品基地。为此,陈云提出:“我们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把出口商品基地搞起来。……同时,还要研究和实行产销直接挂钩。组织外贸部门同人民公社或者工厂直接挂钩。”他还提出:“对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严格的质量检验制度,不合标准的一律不准出口。”出口商品要做到“包换包退,建立信用”。“只有这样,我们的出口贸易才能巩固和发展。”<sup>[10]132</sup>

进口粮食这一外贸活动,无论是从当时国内外环境看,还是从现今的角度看,都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当时,建国初的有限积累消耗殆尽,农业收成已经不能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之一,所以,陈云提出粮食进口的策略得到落实后,我国从 1961 年开始净进口粮食,据统计,1961 年到 1965 年间,国家每年进口约 500 万吨的粮食,从而保证了市场的稳定,起到应急补给和调剂不足的作用。比如,正是有了 1961 年 6 月 20 日前抢运的 215 万吨进口粮,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从而得以化解因缺粮而在重要城市引起骚动的危机。此外,这一时期的进口粮还补充了一部分国家粮食库存,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也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sup>[8]23</sup>。

70年代初,能否利用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再出口,在国内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10月,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等汇报广州交易会的情况后,陈云明确指示说:有的同志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是要坚持自力更生的。但是,现在国内棉花产量不足,我们要利用国际上对棉布需求很大的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再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在产棉国家中,美国是大的原料卖出市场,但美国不会大搞棉布出口,因为它的工资高,工人每工时平均工资达到3.8美元。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今年我们有一个汽车代表团去英国参观,看到兰开郡许多纺织厂都改产卡车或其他东西了。英国工人每工时平均工资是1.6美元,过高的人力成本使得英国纺织工业品价格偏高,在国际上没有什么竞争力。日本过去也大量出口棉布,50年代,日本很怕我们出口棉布挤掉他们,而现在他们也逐年增加棉布进口了。日本工人每工时的平均工资是1.9美元或90美分。和这些国家比较,我国纺织工人的工资水平比他们低得多,产品成本上有优势。……在棉布出口方面,我们还是很有优势的。有人担心用外国的棉花不可靠,其实,国内棉花即使有所计划,有时也有靠不住的时候。购买外国棉花的风险,事先就要预料到。如果3年或5年中有一年买不到棉花,其他年份能买到,还要不要生产棉布?我看还是要生产,要准备长期生产,这样的办法是合理的。我们有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宝贵的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sup>[11]223-224,[12]31</sup>。

陈云对于其他国内急需物资的进口也有同样明确认识和指示。比如,当时正在订货的那套3亿多美元的轧钢设备,有人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否则,就是十足的“洋奴”表现。陈云说:“我们要打大的算盘。中国人多,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这个道理是容易讲通的。”<sup>[11]224</sup>

陈云还善于利用西方国家交易所进行大宗货物交易,支持国内经济建设。

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指示香港华润公司所属的五丰行,尽快完成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的任务。为了完成购糖任务,五丰

行先是委托香港商人先在伦敦和纽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价格每吨约82英镑。与此同时,还派人立即在巴西、澳洲、伦敦、泰国、多米尼加、阿根廷等国购买现货砂糖41万多吨,平均价格每吨89英镑左右。……我国因购买砂糖的现货任务已经完成,于是从5月22日起至6月5日将期货砂糖售出,除中间商应得利润60万英镑外,五丰行多赚240万英镑。五丰行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破例采取了这样的大宗交易和期货交易措施,担心违反国家外贸政策,事后主动向陈云汇报此次交易经过。陈云听取汇报后,对他们的做法予以肯定,陈云就此事专门向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陈云的建议得到国务院的认可,此后,在我国对外贸易历史上开始出现了期货交易的方式,对于搞活外贸增加了新的途径<sup>[11]221-222,[12]31-32</sup>。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陈云胆识过人,充分显示了他在经济领域中的领导才能,为新中国对外贸易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解决了国内经济困难,有力地支持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 三、陈云抓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几点启示

本文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70年代陈云对外贸易的领导活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新中国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这样一个复杂艰苦的环境下,陈云成功领导和开拓了新中国对外贸易,回顾这一过程既有丰富的历史意义,也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实事求是,科学决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事实证明,科学的决策必须来源于实事求是的调查和对经济基本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思考。陈云有一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其精神实质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他抓新中国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50年代初,在新中国面临被敌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等措施,企图扼杀新生的中国时,陈云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把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向果断地转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但陈云清醒地认识到,要冲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仅靠对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还不够,如果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是单一地依靠苏联和东欧国家,也存在着一旦形势有变就不免会受制于人的潜在的风险。所以,陈云还想办法积极开展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港澳地区的对外贸易,甚至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胆开展直接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世界舞台,以至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封锁政策完全失败<sup>[13]141</sup>。

1973年5、6月间,经调查,陈云发现过去的75%面向苏联、东欧国家,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格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已开始逆转,并且是大势所趋。他立刻意识到对资本主义研究的迫切性,要好好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种因素,这将和中国的进口贸易有重大的关系。这一时期,陈云搜集资料,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先后写出了《目前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等文章,对中央制定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陈云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在1956年七届中全会上曾评价说:“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sup>[14]112, [15]998-999</sup>看问题有眼光、能抓住要点是与陈云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调查研究的作风分不开的。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再次对陈云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他说:“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sup>[16]265</sup>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和世界各国打交道,各国之间的贸易愈益重要也愈益复杂。但是,在纷繁复杂的新的世界格局下要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不仅应该认识自己,也应该充分研究外部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就像陈云当年所做到的那样,他说:“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sup>[11]34</sup>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注重调查研究,抓住经济问题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科学决策。陈云抓外贸工作的方法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实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

陈云在制定和贯彻各项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中,能够始终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一系列富于独创而且正确的经济理论观点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也是他研究、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一切行动的前提。他曾明确指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

的,是遵循工人、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意见办事的”<sup>[17]380</sup>,“这样人民才会感到政府能够给他们办事,是人民很好的公仆”<sup>[3]139</sup>。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在他个人身上有生动的体现。

前面我们提及的60年代进口粮食,以及其他一些进口生产资料、机器设备的决定,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等,都是反映了陈云以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为重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建国后,整个中国的政治氛围比较左倾,6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出现极“左”路线。陈云抓外贸工作,面临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陈云并没有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随声附和,也没有因明哲保身而保持沉默。相反,他本着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自力更生与利用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原则。事实证明,陈云在70年代初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及获得的认识成果,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活动中,对中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这种态度下进行的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运用到实际的经济工作中,不但支持了国家正常的经济建设,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使我国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并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十分重要的理论、实践依据。

陈云这种永远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实践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三)外贸工作必须求真务实,努力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促进彼此之间的资源、技术、产品和服务等具有自己的特色的贸易往来,各取所需,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会有良好的补充作用。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获取所需资源、市场和各国人民所创造的先进技术、管理等,对加速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外贸工作不能独立于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建设之外,它更应该是一国整体经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有益的补充。陈云抓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我们可以发现他思考的角度始终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对外贸易工作必须建立在求真务实的基础之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新中国50—70年代,陈云领导的对外贸易工作,冲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封

锁”“禁运”，也打破了封闭自守的陈旧观点，只要是对国民经济建设有利的对外贸易，他都能采取灵活的策略，落实到位，让每一次对外贸易活动都产生积极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对外贸易就离不开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这个核心。

今天，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

竞争和合作，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通过对外贸易引进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模式，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使我国经济能持续、健康发展。回顾陈云领导新中国50—70年代对外贸易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能从中找到他给我们今天国家对外贸易工作留下的宝贵财富，这些宝贵的理论和经验仍然值得我们不断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3]陈云.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陈云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5]之恺.新中国外贸方针的制定[J].中共党史资料,1993(47).
- [6]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 [7]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 [8]唐正芒.陈云与困难时期的粮食进口[J].党史天地,2007(10).
- [9]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10]曹应旺.开国财头陈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1]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孙业礼.“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文革”中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的一些情况[J].党的文献,1995(3).
- [13]李成瑞,朱佳木.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5]陈云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6]迟爱萍,熊亮华.陈云在历史瞬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7]陈云.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Chen Yun and China's Foreign Trade From 1950s to 1970s

YE Ming-yo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From 1950s to 1970s, both the New China and its foreign trade faced a very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Chen Yun led the work of foreign trade during this period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and finally broke down the blockade of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toward China which not only made a good start for the new China's foreign trade, but also provided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Chen Yun; foreign trade; From 1950s to 1970s

(责任编辑 蒋成德)